

高罗佩与中国传统文化

诸天寅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摘要〕 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本文论述了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历史、法律、医学乃至动物学方面的研究,并探讨了高罗佩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琴道》、《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秋公案》、《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等,指出高罗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并具有创造精神,因此得以在学术园地中建树了一座又一座瑰丽巍峨的丰碑。

〔关键词〕 独创,古琴,遣民,公案小说,性社会。

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对国际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他所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继承和研究他的生平和著作,使之发扬光大,借以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这是中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综观高罗佩一生的著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甚广,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历史、医学乃至动物学等方面。中国古代的人才观认为,偏才易得,通才难觅。高罗佩的业绩表明,他是一位难得的通才,他的精深渊博,涉猎之广,令人折服。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创造精神。在他的治学道路上,一方面他能广博地阅览和钻研中国的古书典籍,进行缜密地审慎地思考,爬罗剔抉,阐幽发微;另一方面又能跳出传统樊篱,独辟蹊径,不畏“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对他说来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里斩荆棘,辟草莱,垦春泥,大胆探索新问题,发表新见解,他的一部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著作如同一面面色彩斑斓,鲜艳明丽的旗帜,至今仍在学林的长空高高飘扬。中国历史学者杨廷福、陈左高合作写成的专论《无锡国专杂记》中探讨该校培养人才的经验,文中有两句诗谓:“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我认为高罗佩就是勇于涉远的杰出学者,因此在学术园地中建树了一个又一个瑰丽巍峨的奇观。

高罗佩天资聪颖,从他少年时代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智商超常的天才儿童。1928年,他读中学时,就在荷兰中国文化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汉学论文——《关于〈诗经〉语言的研究》,随后又相继发表了关于《赤壁赋》和《古诗源》的专题论文。众所周知,《诗经》和中国古代的诗赋是很艰深古典的作品,即使对于中国本土的青少年来说,理解和研究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但年轻的高罗佩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精神,敢于向坚固的堡垒进攻,敢于在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上耕耘、播种,这种坚毅顽强的素质使他有可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攀登光辉的顶峰。1936年高罗佩在荷兰驻日使馆工作期间,他为中国的古琴所倾倒,工作之余,殚精竭智,全力学习弹奏中国古琴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终于掌握了这种难度很大的中国古代乐器的弹奏方法,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曾为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王芑生弹奏著名的古琴曲《高山流水》,并谓“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他的精湛演技和对古琴琴理的深刻理解,使王芑生氏为之心折,赞叹不已。1943年他来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参加了专门切磋研习古琴技艺的

天风琴社,并师从著名琴师叶诗梦,同时以琴会友,与徐文镜、饶宗颐等学者结交为挚友。据王芑生氏回忆,1943年中秋佳节,高罗佩“惜未婚妻水世苦女士与美国东方学者艾维廉博士联翩茅舍,嘉陵江畔,瓜果清供,茗鼓宋琴,艾吹铁笛,引吭高歌,展相酬唱,管弦既协,逸兴云飞”。(见《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王芑生序)此次雅集,堪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传统文化绚丽异彩的一次发扬,至今思之,犹令人神彩飞动,心向往之。

高罗佩在日本任职期间,不仅潜心学习中国古琴的演奏技巧,还对中国古琴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他曾用英文写成一部题为《琴道》的专著,书中不仅对中国古琴的产生历史和制作方法、演奏技巧进行了介绍,而且论述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和音乐美学。后来,他的另一部著作《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其写作初衷也是由于东皋禅师是一位古琴演奏家,这位明末遗民在日本享有盛誉,原因之一就是东皋禅师是最早把中国古琴演奏方法传授到东瀛的友好使者。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高罗佩正是把对古琴的爱好与研究,作为介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破口。我认为这个突破口的选择是十分准确的,因为音乐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论语》一书里,记述孔子及其学生对乐相提并论的共有四十九章之多,这充分说明孔子对音乐的重视。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篇),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这里所说的“弦”,即指的是音乐,“歌”,则是指歌唱。孔子适周,“访乐于苴宏”,“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特别是“困于陈蔡”还履险如夷安闲地“七日弦歌不绝”,都充分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音乐的高度重视和浓厚的兴趣。

音乐在中国的产生,从有记载的传说看,开始于黄帝时期,到西周时期,即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经过孔子修订、整理的《乐经》,虽已亡佚失传,但在中国古代,它被列为六部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合称“六经”,可见音乐被重视的程度。古代的音乐不仅用于礼仪和娱乐,而且可以抒发人们真挚的喜悦、怒、爱、思、悲、恐、惊的所谓七情。儒家学派认为音乐的作用和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融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以辅助礼的贯彻实施。《礼记·乐记》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司马迁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启发诱导人的善良思想,以淳厚民俗、敦厚民间道德教化。孔子说:“兴于诗(读诗使人兴奋振作),立于礼(执礼使人能在社会上立住脚),成于乐(音乐能使人完成诗和礼的这些作用)”(《论语·泰伯》)。三是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激励人的高尚情趣。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辞源·“伦理”注》)。孔子主张“乐而不淫”(淫指靡靡之音),庄子说:“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萧然(温和)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篇》),均可说明孔子倡导音乐的作用是同做人的道德标准联系起来,音乐对人们的道德情操和高尚情趣的形成起着很大的影响。古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乐器,其演奏技巧一直被视为是十分高雅深奥的艺术,有所谓古琴通心音之说。上述高罗佩演奏过的《高山流水》古琴曲,其来源是表现春秋时代俞伯牙和钟子期以鼓琴定交的故事,伯牙鼓琴,子期听之,意在高山,曰巍巍乎高山,志在流水,曰荡荡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断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由这一有关演奏古琴的音乐故事,引申出知己、知音的名词。当然,如果没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修养,无论演奏古琴抑或欣赏古琴名曲,都是难以做到的。正如古人云:“七条弦上五音寡,此艺知音自古难。”高罗佩通过研习中国的古琴,绝非仅仅是掌握了一种中国古代乐器的演奏方法,他通过对琴曲的感悟,对琴理的探秘,对琴友的交往,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精髓,比如礼乐之间的关系,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音乐与人际友情的联系等等,通过音乐这一途径,高罗佩才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步登堂入室的。

高罗佩在日本任职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明末清初中国义僧东皋的文献材料。明末,浦阳(今浙江省浦江县)义士蒋兴铨于明亡后,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志在恢复,事不可为,乃投荒东渡为僧(时在朱舜水之后),法号东皋,又称心越禅师。东皋禅师在东瀛日本,名气很大,据王芑生氏说,其名“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即一酱油之微,危人市販亦有如颂法师功德者”,但“中土罕知其人。”1944年,高罗佩在中国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战时土纸印成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这是把他在日本任职时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经过整理编辑而成。在自序中谈到他在日本历时七年(1935——1941),于

日本各地遍访禅师遗迹，辑为全集，“并为之传以冠之。什梓有日，会太平洋战起，痛深国难，此事遂废。然萧条异代，如闻雅音，羁旅同仇，弥怀高蹈，禅师之不可无传于中土，审矣。”高罗佩还请当时中国驻日大使许士英作序，许士英在序中说：“以三百年前之志士不传于本国，而传于异邦，不传于本国人士之推崇，而传于远在荷兰之学者，探幽发微，以彰明之，东事有知，得无笑为异数者乎！”的确，一位西方人为什么竭尽全力历时七年，广为搜寻，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这部介绍东皋禅师的集刊呢？用意十分明显，即借颂扬明末义士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激发外御仇寇的勇气和斗志。高罗佩最为赞赏东皋禅师《读〈苏武传〉》七绝一诗，诗曰：“持节归来十九年，也曾啖雪与餐毡。孤臣心固如金石，不枉汉廷有大贤。”崇尚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道德观念，从高罗佩整理出版《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这件事上，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崇尚气节的民族性格和道德观念理解得多么深刻。东皋禅师其人其事正是由于高罗佩的推崇和宣扬，才赖以流传中土。高罗佩介绍东皋禅师之功，值得中国人民很好地铭记。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在高罗佩的著作中最熟悉也是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狄公案》了。特别是在1987年由山西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狄公案》之后，狄仁杰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于荧屏之上，狄仁杰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它的作者高罗佩的名字也开始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成为一位受人崇敬但又多少有些感到不可思议的外国学者和作家。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高罗佩在远东工作期间，致力于广泛搜访中国古籍。在他的收藏中，中国古本传奇小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全神贯注地博览了这些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之后，深深被其中曲折生动的情节所吸引。其中有一部反映唐代武则天时代名臣狄仁杰勘破几起谋杀案的小说尤其引起高罗佩的重视。他认为这部小说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悬念，较之西方的侦破推理小说毫不逊色。于是他动手将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出版时定名为《武则天四大奇案》（实际上只翻译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即前三十回）。此后，他利用外交公务以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着手创作了一部以狄公为中心人物的断狱破案小说。

高罗佩撰写系列小说《狄公案》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即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传奇远比西方流行的侦探推理小说历史悠久，手段高明，他以中国唐代断狱名臣狄仁杰为模特儿塑造出一个完美可信的中国古代封建大法官的形象，让西方人和那些沉溺于西方侦探小说中的中国人了解中国古代法官的本领，尤其是在逻辑推理能力和犯罪心理学、尸体检验学等方面研究的造诣上，决不亚于西方现代大侦探。

高罗佩为什么选中唐代的狄仁杰来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呢？这一方面是《武则天四大奇案》等中国传奇小说对他的启发和影响，另一方面狄仁杰是史有可征的断狱能手，在刘昫撰的《旧唐书》卷八十九，宋祁撰的《新唐书》卷一百十五，都列有狄仁杰传。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唐代武则天时代的大臣。他一生忠于朝廷，刚正廉明，敢于反对贪官污吏，客观上保护了人民利益，深受人民群众爱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政绩卓著的出色的政治家。现在太原市南郊的狄村，即是狄仁杰的故里，这里有一株枝叶繁茂的古槐树，相传为狄仁杰母亲所植，还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狄梁公故里”五个大字。

狄仁杰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少年时代勤奋读书，后来考中了明经（相当于明清时代的进士），出任汴州参军。后来黜陟使（有升降官吏大权的钦差大臣）阎立本发现他才学出众，称赞他是“沧海遗珠”，便提拔他升任并州法曹参军。在狄仁杰传中明文记载，“仁杰，仪凤（高宗年号）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这是说唐高宗李治时，他转升为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的大理丞（最高法院院长），管理天下刑事诉讼案件，在一年之中处理了积压案件多起，涉及到一万七千人，公正地处理了不少冤案，受到朝廷的赏识和称赞。有一次，两位武将误砍了太宗昭陵的柏树，高宗在盛怒之下要把这两位武将处以死刑。狄仁杰据理力争，上谏说：“皇上的法律已经公布，犯罪者应按其罪过轻重而有差别，怎么能把未犯死罪的人处以死罪呢？由于误砍了一棵柏树，就要处死两员大将，后人会怎样评说皇上呢？”后来高宗终于免除了这两位武官的死罪。

公元660年，狄仁杰还制止过为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县境的管涔山上），

地方官员动员数万军民赶修一条绕过妒女祠的新驰道,向高宗面陈这是劳民伤财的迷信做法,高宗夸奖他说:“真是个大丈夫!”公元688年,他在担任江南道巡抚大使期间,曾奏请武则天批准,一举焚毁了江南一千七百多座神祠,只留下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座神祠。

公元688年,即武则天废掉中宗以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第四年。这年七月,唐代贵州、博州刺史李贞,豫州刺史、琅玕王李冲等起兵“讨伐”武则天,李冲起兵后七天便溃败逃散,李贞在博州起兵响应,数日后也兵败自杀。豫州民众在大将张光辅进讨李贞的唐军到达时,出城归降,却被张光辅野蛮屠杀了几千人,继而张光辅率领的军队又入城以清查李贞亲党为名,到处抄家捕人,连坐者达六、七百家,五千余口。其中有两千人被判处死刑。这时由武则天委派的新任豫州刺史狄仁杰看到这么多无辜百姓受到株连十分不安,立即下令给这些死囚开释刑具,一面上书武则天,奏请“仁恤”。武则天准奏,下诏将这些人全部流放到丰州(今河套上的五原)。当这批流放者路过宁州(今甘肃东部宁县)时,宁州的父老们都出来迎接慰问他们,并说:“是狄使君救活了你们!”原来,狄仁杰曾经做过宁州刺史,由于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宁州百姓特地为他建立了一块“德政碑”。后来,这批流放者到了丰州,也为狄仁杰树立了感恩的纪念碑。

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第二年,狄仁杰奉召回朝,被提升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狄仁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完全平坦的,长寿元年(693年),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诬陷狄仁杰等人密谋反叛,被逮捕入狱。为了免遭酷刑,狄仁杰不得不违心承认谋反是实。后来审判官王德寿让他招供宰相杨执柔也是谋反的同党,狄仁杰不愿牵连别人,当堂撞柱表示拒绝。狄仁杰被押回监狱后,机智地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绸布,写了申冤诉状,塞到棉衣里面,请求狱吏将棉衣送回家中拆洗。他的家属在拆棉衣时发现了诉状,马上递交到朝廷。在武则天亲自过问下,免除了狄仁杰的死刑。释放后,他被贬官到彭泽(今属江西)当县令。

狄仁杰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公元696年,中国东北边境的契丹族首领李尽忠率领军队进犯河北。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魏州刺史(魏州在今河北临漳县境)。前任刺史调集了大批农民来守卫魏州城,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到任后,做出果决的判断,他认为契丹人还在远方,未必敢深入到魏州,不需要过早地兴师动众,耽误农业生产。便下令让征集来的农民统统回乡。不久契丹人果被击退。魏州百姓为狄仁杰建了生祠,表示敬仰和感激。武则天晋升他为幽州(今北京地区)都督,赏赐给他紫袍玉带,并亲笔在紫袍上题写了“敷政术,守清功,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公元698年秋,他被任命为副元帥(元帥是太子李哲),统兵三十万,征讨北部边境的突厥可汗。狄仁杰大获全胜,收复了不少失地。平定突厥骚扰后,狄仁杰被任命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他积极采取措施,使河北诸郡的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武则天加封他为“内史”(类似首相),还赐给他一座别墅。

武周后期,狄仁杰多次上书进谏,要求改革弊政,制止豪华奢侈之风。在他的屡次陈明利害关系下,武则天放弃了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的打算,被迫召回儿子庐陵王李哲,立为太子。狄仁杰于久视元年(700年)秋,还极力谏阻武则天建造一座大佛像的意图,武则天认为:“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狄仁杰由于深得武则天的信任和器重,凡他提出的适应历史发展方向,有益于人民休养生息的善政,大都获得批准。

狄仁杰在朝廷中地位极高,享有特殊待遇。每次朝见,武则天总叫狄仁杰不必按常规行跪拜礼,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她对狄仁杰尊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晚年多次请求告老还乡,武则天坚决挽留,特许他不必和其他宰相一样到朝内值夜住宿,并嘱咐其他大臣说:“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公元700年6月,狄仁杰病逝,享年七十一岁。闻知狄仁杰死讯,武则天非常悲伤,当即痛哭失声,叹息说:“朝堂空矣!”随即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此后遇到朝中大臣对某些大事不能做出决断时,武则天总是思念狄仁杰,说:“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武则天在狄仁杰去世后,追赠他为文昌右相,谥号文惠。中宗即位,追赠为司空。睿宗时又追封

为梁国公。因此后世又称他为狄梁公。

从上面狄仁杰一生事迹的介绍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狄仁杰具有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各种素质，他的作为深受百姓爱戴，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是当之无愧的。高罗佩当年一定是为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生平所吸引，他经过缜密的思考，选取了狄仁杰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处理过的各种类型复杂疑难案件，在继承和借鉴中国原有的传奇故事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狄公形象。把中国历史古籍记载中的一代名臣狄仁杰转化为现代出版的侦破小说《狄公案》中的狄公形象是一次大胆而艰辛的尝试。高罗佩凭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法律制度、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以及他的敏锐的感受力，出色的表现力，避免了中国晋代著名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为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成功地陆续写成了包括十五个中篇和八个短篇在内，共约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煌煌巨著《狄公案》，先后在印度新德里、荷兰海牙等地连续出版了十七部狄仁杰探案故事。小说中展现出广阔、丰富的历史背景，触及到唐代社会各阶层士民的生活场景，让读者窥视到从各级官吏、富商巨贾，高利贷者、士大夫知识分子以至强盗、地痞、乞丐、小偷、风尘女子等琳琅满目、形形色色的古代中国人物画卷。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勘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书中歌颂了狄仁杰的为民做主和缜密思维，宣告了邪恶势力的最终溃灭并受到法律的制裁。作品中，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巧妙结合起来，把东方小说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同西方现代文艺学的突转、悬念、余波融为一体。在叙述方式和写作技巧上，可以说它既不同于中国的公案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福尔摩斯、亚森罗平、波洛和格雷的探案故事，从一定意义上说做到了东西方文学的互补与交融。

高罗佩同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能够做到忠于生活，忠于历史，把自己的笔触伸向历史的深处，反映出社会的本质特征。他发展和超越了前人的类似创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面貌，达到了艺术上真正的创新。所谓创新，不是简单地更换一件新衣，而是利用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提供的各种原料，独出新裁地制作出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妙佳肴。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不同点，也是这一人物形象最为光彩照人之处，是作者赋予他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狄公的勘破疑案，抓获元凶，使含冤负屈者得以昭雪，使逍遥法外者受到惩罚，这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尊重人的价值，重视生命的意义这样一种朴素的民主意识，从而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根本没有民主，封建法律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观念根本对立。可以说高罗佩在狄仁杰身上寄寓了古代民众和现代人共同的美学理想。即清正廉洁，不畏权势、精明干练、智勇过人等美好品格，是理想化的，并非封建官吏所能完全具有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形象往往打上很深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的烙印。清官断案往往既不靠智慧，也不靠调查，而是靠神灵显身、神佛托梦、鬼魂诉冤等超现实的因素，其结果导致清官形象逐渐失去光彩，缺乏艺术个性，落入脸谱化、偶像化、公式化的窠臼，成为神化的人物。而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却是富有个性，具备人情味和幽默感。他虽然是位文官，固通文墨，但亦精武功，刀枪拳棒自是样样谙熟。由于精通武艺，就为他深入破案第一线，直接与犯罪分子周旋提供了极大方便。他胆大心细，智慧超群，注重到犯罪现场调查研究。他不轻信罪犯口供，而是凭借偶然发现的蛛丝马迹，深入推敲，最终侦破案情，使复杂艰难、扑朔迷离的现象一个个追踪到水落石出。比如《湖滨案》中韩咏南家佛堂的那方翡翠碑额，上面所刻的那段经文，语义深奥，但经狄仁杰与那页古本棋谱残局相对照，终于悟出“若汝明吾言，即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这十七个字成为查明疑案的关键环节。狄仁杰机敏的洞察判断与合理的解析、推衍令人击节赞赏，钦佩不已。狄仁杰虽然料事如神，但没有被神化。他经常被复杂的案情弄得一筹莫展，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他重于自责，善于听取部下的意见，这样才能转败为胜，走出误区，制服罪犯。狄仁杰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他的破案故事是科学的、世俗化的、符合逻辑的，他不相信神灵鬼怪，摒弃荒诞怪异的解释。他的破案手段严格地依赖于深厚的犯罪心理学素养、丰富的刑讯经验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因此他与中国公案小说中

的清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异。

除了主人公狄仁杰之外,高罗佩笔下的其他众多人物也都是栩栩如生的,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意味,生动风趣,呼之欲出,既有新鲜感又有真实性。特别是他手下的忠实部属,如洪亮、陶甘、马荣、乔泰等,都对他侦破案情起着极大的辅助作用。这使我们联想到《包公案》中包龙图包拯的手下也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也有一位得力助手医生华生。“红花虽好,还需绿叶相扶”,主人公和次要人物的默契配合,密切合作,达到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

高罗佩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为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时能做到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摹物态,刻意求工。正如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此话虽略显夸张,但却包含着文艺创作中一个重要道理。《狄公案》中篇篇均说人情物理,无涉荒唐怪异,故而能风靡于世,历久不衰,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狄公案》的各篇故事一般都开卷便展示案情,布下悬念。故事发展错综复杂,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案中有案,奇峰迭起,或数案齐发,险象环生,彼此牵连,互相映衬,确实做到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最后百川归海,真相大白,罪犯揭出,令人拍案叫绝。总之,故事的发展始终能够紧紧攫住读者的注意,使读者或为人物命运担忧,或为案情变化苦苦思索,使读者宛若置身故事之中,及至最终破案,便可验证自己原来的猜测、设想是否正确,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种重视文学性、趣味性的谋篇布局,打破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程式化,作者苦心经营,匠心独运,使读者耳目一新,备感愉悦。

作者在语言运用上也相当简洁流畅,要言不烦。作者非常重视语言的传达功能,努力追求一种明快清晰的语境和语言风格。在叙述过程中避免冗长、罗嗦,没有很多引诗或与情节关系不大的闲言碎语,也没有大段引用在审案、定案过程中作为依据的各项法律条款。

正由于高罗佩把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巧妙地渗透在中国古代的侦破故事之中,才使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获得了轰动效应,自它发表问世之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再版不绝,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成为风靡欧美最畅销书之一。狄仁杰也随之成为妇孺皆知的大侦探,高罗佩因此也声誉鹊起,遐迩闻名。

公案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种子。魏晋南北朝小说,如《搜神记》里面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记叙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峻的续作、宋代郑克《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此类著述。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小说有明显影响。但是真正意义的公案小说大概是从南宋“说公案”开始。宋元话本中的《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尚》等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佼佼者。到了明代,出现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等小说和《明代说唱词话丛刊》中有关包公故事的词话八种。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之所以概述了一下中国公案小说的流变历程,主要是想说明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因为犯罪和惩罚,是中国传统文学(不论文言、白话或口头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世界各国的文学,在西方侦探和犯罪小说兴起以前,这个主题都不像在中国文学中那么重要。中国传统文学中,犯罪被视为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触犯,在人或超人的层次上都是如此。罪与罚也是对“报应”观念的阐明。(参见美国P·韩南著《中国白话小说史》)对中国公案小说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辽宁大学的黄岩柏教授于1991年5月出版了《中国公案小说史》,成为把公案小说单独从小说史中析出作详尽论述的一部专著。但是一个共同的事实是,在中外学者的有关中国小说史或公案小说史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高罗佩的《狄公案》。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人,不便列入中国的小说史著之中。其实,我认为完全应该把高罗佩的这部杰作列入。因为到了民国以后,公案小说逐渐消亡,其后是武侠小说日益兴盛的时期,五十年代在海外正当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走俏之际,《狄公案》重振

公案小说余绪，异军突起，在西方赢得了为数众多的读者，这一文学现象十分值得文学史家予以重视和研究。可以说高罗佩用西方的进步观念为中国业已衰微，濒于绝灭的公案小说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居然使之起死回生，大放异彩，这不可不谓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狄公案》的出现在一定的意义上突破了中国文学创作自我封闭的格局。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审视和认识它时，一方面应贯通古今，视古今为一个历史整体，另一方面则应注重中外文学的沟通、交流和相互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在长期交流接触中，必然互相影响，彼此交融，从而产生出具有新的艺术品格，艺术生命力旺盛持久的优秀作品。《狄公案》的成功恰恰就是一个明证，东西方互补的成果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中国早期的公案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涉及到两性犯罪的问题。例如《简贴和尚》、《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三篇小说涉及的三个妇女，两个是已婚妇女，一个是宫廷里的夫人；在案情中，一个清白无辜，一个有罪，一个是误入迷途。三个罪犯都是典型的，一僧一道，一个政府官吏。公案小说往往与性罪错或性犯罪有关，这是因为涉及男女之间的桃色事件容易引起听者或读者的兴趣，另外也说明在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尽管男女交往极不充分并有种种严格的规范，但在情爱、性爱方面仍有顽强的驱动力，甚至导入误区，出现不择手段的勾引或通奸。正由于中国早期公案小说大多涉及两性问题这一特点，使高罗佩在研究公案小说的同时，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色情文学。1951年他在日本出版了《明代的色情文学》一书，详细介绍并论述了明代色情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他在书中揭露，虽然中国的达官显贵和士大夫们在表面上高喊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但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他们的私生活糜烂不堪，极其腐化。此外高罗佩在创作《铜钟记》时，故事内容涉及到僧徒的不检点行为，日本出版商曾拒绝出版。后来他又撰写了《迷宫案》，日本出版商认为书的封面应设计为一位裸体女人的画像。高罗佩虽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只得到处搜寻附有裸体女人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集。找寻中他偶然发现了一套明代色情木刻画集，以后他将整个画册加上详尽说明及原附文的译文出版，为防止扩散，一共只印五十部，取名《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1951)。这本书成为他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的基础。这部高罗佩晚年的力作于1990年11月已由李零、郭晓惠等译出，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副标题是“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这部填补中国性生活史空白的著作，具有严肃的科学性和大胆的突破性。书中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独特，在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这一问题上，被西方汉学界公认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权威之作。美国学者坦纳希尔(Reay Tannahill)在其《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书中遍论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性生活，述及中国，几乎全取自此书。她说：此书“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确属至论。虽然此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是为了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偏见，但它的内容对中国读者也同样有耳目一新之感。这部著作的问世，突破了被中国古代人认为最隐蔽、最神秘的一个禁区，纠正了西方人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见《古代房内考》序)。高罗佩的这一工作正像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增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高罗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他还发表过不少其他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译作和专著，如米芾《砚史》译本(1938)、嵇康《琴赋》译本(1941)、《春梦琐言》(1950)、《棠阴比事》译本(1956)、《书画说铃》译本(1958)、《中国绘画鉴赏》(1958)、《中国长臂猿考》(1967)等。高罗佩虽然是一位西方人，但他的创作个性里却流动着中国文化的血液。他在紧张繁忙的外交官公务之余，抽出闲暇时间，寻找研究主题进行发掘整理，并将丰硕的成果奉献于世。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深，他不限于研究某一时代或某一学科，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从中寻觅并发现他人尚未触及或忽略的研究主题。通过他的一系列专著和译作，充分显示出他是将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鉴赏家集于一身的博大学者，因此奠定了他在西方现代汉学家中的显赫地位。

最后我想初步探究一下高罗佩为何如此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中国传统文件的弘扬阐发及传播

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古老、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瑰丽斑斓的色彩,使高罗佩为之倾倒。另一方面也同高罗佩自身的条件密切相关。他的天赋聪颖,勤奋好学,精通多种语言成为他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内因。早在他的童年时代,随父母到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的一段经历,在爪哇华人居住区所获得的见闻和他父亲收藏的中国古董就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好奇心。此后他的外交官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方各国,外交职务为他提供了研究东方文化的契机。在亚洲的日本、中国、印度等国担任外交官期间,使他有幸悉心收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藉、古玩、字画和乐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高罗佩恰恰都做到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他与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的结合,使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了一步。贤惠能干的水世芳女士相夫教子,成为高罗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得力助手。此外,他同王梵生、许世英、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徐悲鸿、胡道静、苏渊雷、马衡等社会名流、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也对他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有了直接的感性的认识。高罗佩是一位富于实践精神的学者。他不仅热衷于学习中国的琴棋书画,还模仿中国文人取中国名号及书斋雅称。据他的夫人回忆:“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他的绘画造诣也很高,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亲自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模仿得维妙维肖,简直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他亲手绘制的插图,乍一看,会让你误以为是出自中国古代画家之手笔。为消除人们的误会,他在每幅插图上都署有“H·R·H”的签名。这三个字母是“荷兰·罗伯特·汉斯”的缩写。他曾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这里面的“笑忘”是他自取的字,暗寓“笑忘百虑”之意;“芝台”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与水世芳女士结婚之后,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他书斋中的书桌、书柜也都是中国的紫檀硬木制成的仿古式样。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高罗佩成为从思想到名姓全都中国化的学者,这在近世欧洲,实为罕见。

高罗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成就促使一大批西方的汉学家步其后尘,努力探索,完成其未竟事业。同时也使中国知识界进行反思。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传统,鄙视自己民族文化的虚无心理无疑是一剂清醒剂。今天,我们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必然会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让我们携起手来,进一步共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使之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附记】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荷兰前任驻华大使杨乐兰先生、荷兰傅万莲琴(H·DE VRIES)女士的帮助,特此鸣谢。同时也怀念我的已故挚友孙逸忠先生,他曾是我在研究高罗佩著作中的合作者。